

第
二
辑

钱 锺 书

■ 冯芝祥 编

研
究
集
刊



Qian Zhongshu Yanjiu Jikan

Qian Zhongshu Yanjiu Jikan

Di ER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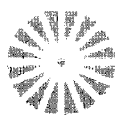
Feng Zhixiang Bian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上海三联书店



钱锺书



■ 冯芝祥 编

研究集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锺书研究集刊. 第2辑/冯芝祥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12

ISBN 7-5426-1435-5

I. 钱… II. 冯… III. 钱锺书—人物研究—文集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1056 号

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

编 者/冯芝祥

责任编辑/冯芝祥

装帧设计/范桥青

责任制作/沈 鹰

责任校对/顾崖清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制 版/上海申亚出版发展公司

印刷装订/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75 千字

印 张/11.75

印 数/1—3100

ISBN7 - 5426 - 1435 - 5

G·424 定价 20.00 元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汉，整个儿说来，
我再也见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He was a man, take him for all in all,
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

—— 莎士比亚：《汉姆莱特》



上海三所书店

目 录

钱先生交往回忆之一	敏 泽 (1)
钱锺书的性格	范旭仑 (14)
漫话钱锺书先生	刘衍文 (73)
论钱锺书文体	吕嘉健 (104)
读《宋诗选注》	刘永翔 (120)
钱锺书与《唐诗选》	范明辉 (143)
钱锺书《诗经》艺术研究述评	林祥征 (186)
《石语》评笺	刘梦芙 (203)
“不教诗带渭城声” ——钱锺书《叔子赠行有诗奉答》读解	刘玉凯 (252)
《槐聚诗存·偶见江南二仲诗因呈振甫》的注释问题	王绍曾 (260)
《围城》婚变篇	叶德裕 (265)
苏文纨的肖像与学历	叶 凡 (278)

论《围城》的感觉深度	吴其南 (285)
读钱刍言	钱定平 (297)
正钱录	鲁 岩 (325)
读《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李廷华 (337)
翩翩	亦 木 (351)
读钱志小	吴宗海 (352)
如何对得起钱锺书先生和读者	陈福康 (354)
《〈钱锺书散文〉纠谬》增订	张克逊 (361)
编后记	(368)

钱先生交往回忆之一

敏 泽

“文革”结束之后，有幸结识钱锺书先生，在以后较长的时期内，直至先生因病住院前，并有较密切的往还，能够经常聆听到钱先生的教言，益人神智，沁人心脾，在为人、治学、思想方法方面，受益匪浅，没齿难忘。今后将陆续把与先生交往中的有关言谈和往来整理成文，以志纪念。

一 关于“文革”后《围城》的出版

约在 1979 年底或 1980 年初，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曾经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许觉民先生，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几次找钱先生，请求钱先生将其《围城》交该社出版，都被钱先生以“不出”二字坚拒（钱先生当时不肯将《围城》交出版社重印，和此小说 1946 年在《文艺复兴》连载，1947 年在上海出版后，受到当时一些“左”派们的批判，曾经引起钱先生的不满可能有关）。觉民先生无奈，转求于我。对此我毫无把握，答应有机会试试看。随即给钱先生打电话，委婉地劝说他答应重

版此书。不知什么原因，这天钱先生的心情特别好，没有等我把话完全说完，就痛快地答应了，说：“你既然说了，就答应他们，让他们出吧！”我听了很高兴，旋即将钱先生慨允之事转告许觉民先生，觉民先生听了也很高兴，说他将很快把此事告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又说，要我届时带出版社的人去见钱先生，当面商议此事，不然出版社的人不敢去，怕吃闭门羹。

于是我为此事再次给钱先生打电话请示。先生回答说：“我钱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既然答应了，如何能变卦？让他们放心来就是了。你不必陪他们，你来是谈学问，他们来是谈生意……”

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将《围城》重新出版了。第一次印了十三万册，接着又印二十万册^①。书出版之后，我很快写了一篇较长的论文《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艺术杰作》在《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一期发表。这篇文章是对传统偏见的一种极力反驳，但后来看却有明显的不足。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权威”不仅为之侧目，文艺界一些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如我所尊敬的丁玲同志等也纷纷对我进行责难，有的甚至质问我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当然今天人们都承认了《围城》是一部艺术杰作这一事实，无人再进行类似的指责）；但后来又有人说这是什么“五点文”，这都不必说它了。我的评论文章写妥之后、发表之前，曾写信给钱先生，建议他审阅一遍。钱先生两次寄信谈及此事，一为：“拙作蒙椽笔论定，

^① 后来钱先生的来信说到《围城》的俄译者索洛金(V. Sorokin)“来信”，“告《围城》已于今夏在莫斯科出版销售，印数五万册。……两个霸权的超级大国人士将拙著翻译，亏得我国自己已在重印，否则按照‘敌人拥护的我们要打倒的原则’，区区的日子就不好过，而我兄也要受拖累了”。

真所谓‘死且不朽’者，感荷感荷！”一为：“《围城》文章，由您去写，完成后不要给我看。因为正如您明眼人一语道破，我一定脸红而导致手痒，手痒而导致手狠，手狠而发展为下毒手，结果将如红娘所唱：‘将恩变为仇，半途喜变做忧’，索性眼不见为净……”

《围城》出版之后，先生即托人带来一册，除题签外，并写了下面几句话：

孙虔礼《书谱》云：感惠酬知，断章取义，题识拙著，以赠侯子。

槐聚

二 向钱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

钱先生的博闻强记，在学术界可以说是很少有的，流传着很多这一类的传说。我在与钱先生的交谈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体会。下面的这封信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由于钱先生平日甚忙，我一般是轻易不打扰他的。但80年代初期，我在审校、标点《〈清实录〉文化资料摘编》时，遇到乾隆的一段批语：“故为翁子徽国之语以混之”，“翁子徽国”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他或他们又是谁呢？因为人名旁边要用专名号，不清楚底蕴，就很难决定怎样处理。于是在半年之内，除了我自己多方查找外，同时还先后向国内五六位在注释、校勘方面真正第一流的学者如程千帆、王利器、周振甫等请教、求解，并将这句话的上下文告诉我所请教的朋友，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相同的：不了解。我有一次给钱先生写信时谈了上述情况，并说实在是出于不得

已，不得不打扰他。我请求他：若了解，顺便告知即可，无论如何不要耽误时间为我去查阅资料，那样我将十分于心不安。不想信由邮局发出，中间只隔了一天，第三天一早就收到了钱先生如后的复信，肯定钱先生是在接到信后立即作复的，不然不可能这样快就收到他的复信。信上说：“垂询一事，弟觉颇易明白：‘翁子’乃朱买臣字，‘徽国’乃朱熹封爵，皆指明之国姓，犹红色之为‘朱’耳。兄试以此意求上下文，看说得通否？”钱先生的答复完全是准确无误的。原来这个风流皇帝乾隆故意把朱熹的爵号与朱买臣的字并列在一起了。“徽国”为朱熹爵号，这一点我和其他学人也曾想到过，但由于只是从爵号上想，“翁子”系何人就再也想不到了。

三 钱锺书先生谈“意象”

这里拟将钱先生对我的一篇论述意象问题的文章的修改和批示公之于世，从中既可以见出钱先生辨析问题之精辟，可以见出他对后学的鼓励和热情帮助，以及他对中国意象问题的十分重要而独到的见解。这一意见多年来却一直不曾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仍在沿袭和陈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其中有些说法也是我个人过去的看法，但经钱先生提出后我本人早已改正），因此将钱先生关于拙文的批示公之于众，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1983年2月间，我经过长期的学习与思考，写了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国古典意象论》，文章所论述的是对长期以来一个重要学术问题的历史误会的辩证。“五四”以后直至80年代初期的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学者如梅光迪、闻一多、梁实秋、朱光潜等等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意象”的语

汇，“意象”一语产生于西方，是英文 image 的译名；国外的一些华人学者，如高友工、梅祖麟以至叶维廉等等师承这一说法，在六七十年代所写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凡涉及“意象”问题的，也不加思索地视之为“意象主义”的副产品。80年代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学人谈论“意象”问题一时成风，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都毫不例外地要在其前加上一个修饰词：“西方兴起的”，我那篇文章就是为了纠正这一历史误会而发。文章打印好之后，心中暗自思索：文中论述中国意象论的发生和发展及以后国人的误解的部分，还是有把握的，但对文中提到的与此问题有关的几位西方学者，如庞德、韦利等等，尽管我自己亲自跑过几家图书馆查阅过有关资料，也征求过从事英美文学研究学者的意见，但总是感到把握不是很大，于是想到了请教钱先生。

钱先生很忙，我从来就是极少打扰他的，而此时他又在忙于《谈艺录》修订本的收尾工作，这也是我期待已久并希望他尽早完成之事。但几经考虑，还是决定麻烦他帮助审订一次，于是破例将一篇打印稿给他寄去。

我在3月24日将稿件寄出，三天以后就收到了他的批改并批示，全文批改和批示共约二十来处，除个别字句的修改不计外，最重要的批示有以下几点：

1. 关于西方的意象主义，我在谈到它在本世纪20年代的兴起时是这样说的：

意象主义的“大师”们，如美国的艾滋拉·庞德（Ezra Pound）、格莱汉姆（A. C. Graham）、英国的韦利（A. Waley）等等都曾参与这一工作……

钱先生在“‘大师’们”几个字下划了两条杠，勾去了格莱汉姆的名字，划去了“等等都曾参与这一工作”。在旁边批了几个“不如不……”，显然不曾写完，在此处却写下了一段重要批语：

Pound 可称‘大师’，Waley 已只能称翻译中国文学名家，Graham 何物哉！！

有了这段批语，上面提到的那句未批完的话语义就自然明白了。这个批示是很重要的。应该说明的是：上面我的那一提法，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借助于人的说法，但钱先生却认为那一提法极不准确。

2. 我将此文寄给钱先生时，原意只是想请他对西方意象论的有关论述是否恰切提出批评，没想到关于我国意象论的论述，钱先生也提出了许多精审卓识的意见。比较重要的有：

我论述中国意象论的源头时，谈到了两点，一是认为《周易》虽未“将意象作为一个组词、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但对“‘意’与‘象’关系的论述，却是很富启示意义的，并为后世的‘意象论’奠定了基础，发生了长远的影响”。钱先生在这段文字之旁批曰：“此言甚好！”对论述另一个源头的一段话：“在先秦的典籍中，虽然不曾提出‘意象’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同样接触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是《庄子·外物》中的几句名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钱先生在旁边批了一段话如下：

此节必须加些申说，因为庄子虽是文学家，但他这一节专为哲学而发，而且专为他的那种超越语言文字的神秘经验而发，正是我上文所说的“变其象”、“舍其象”（指前面我曾引到的他论述《诗》之象与《易》之象之相同与相异的那段著名的话——敏泽注），极不重视“象”，极不重视“言”，参观《管锥编》论神秘宗敌视语言文字，庄子复喻（变象）。①

这意见自然是完全正确的。

3. 我在论述文字创作应该意余言外之后，有两句引申，为：“意余言外，实即意溢象外”，钱先生在这两句话下面划了两条杠子，并在一旁批了一大段话：

例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是有“象”有“意”的好诗，“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人生无百岁，长怀千岁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等，都是好诗。但“象”似乎没有，而“意”却无穷。不一定。因诗文不必一定有“象”，而至少应该有“意”。文字语言基本功能是达“意”，造“象”是加工的结果，即本来是状物色物象的具体字，经千百年亿万人的惯用，也发挥“象”的作用，作者必须施起死回生、翻旧为新的手段。

这段批示更是精辟的，也完全是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的，“言外”也并非“象外”。

① 指《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1册第12-4页及第2册第406-8页等处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4. 特别重要的，是钱先生在我提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第一次提出了创作中的意象的问题”旁边的一段批语：

刘勰用“意象”二字，为行文故，即是“意”的偶词，不比我们所谓“image”，广义得多。只能说刘的“意象”即“意”，不能反过来。

我原来是将《神思》篇中出现的“意象”作为这一理论范畴的首次提出的，钱先生则认为在这里，“意象”实即“意”之偶词：“窥意象”是偶“寻绳墨”，绝非后世所说的意象，这辨析是精辟并完全符合实际的。所以我的文章在发表时完全采纳了钱先生的意见。并作了以下的说明：

应该说明的是：“意象”作为一个组词虽然被刘勰第一次提了出来，但他所说的“意象”和我国文论史后期所说的“意象”，或西方所说的“image”含意并不尽相同，比之要广泛得多。《文心雕龙》由于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意象”实属一个偶词，其含意实际上只是一个“意”字。后来唐代司空图的《诗品·缜密》中提到的“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同样是如此。

文章虽然不曾进一步申述，但言外之意是明确无误的：不管是刘勰所说的作为“意象”对应词的“绳墨”，或司空图所说的作为“意象”对应词的“造化”，都是不可以析之为二，即“绳”与“墨”或“造”与“化”的；同样，作为与“绳墨”或“造化”相对应的偶词自然也不可以、或不应该析之为二，即“意”

与“象”的，这是再也明显不过的。

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有十六七个年头了。从它发表之后（此文最初发表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上），文中的主要论点都已被学术界普遍所接受，此后凡是论述意象问题的文章，再没有人将它视之为西方文字的专利品了。只是在论及中国传统文献中“意象”这一概念何时正式出现时，几乎所有论者都仍旧沿袭了被钱先生批驳了的刘勰正式提出、司空图继之的说法，其实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我看来，前面提到的钱先生关于一问题的论述，是很难反驳的。

5. 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联的，是钱先生在我论述司空图《诗品》及唐、宋时期有关“意象”情况的一段批语。

我的那段论述原文如下：

魏晋到唐宋期间，关于“境象”、“境界”、“象外”的提法很多，但关于“意象”的提法却并不多见。例如司空图著名的《二十四诗品》的《缜密》条中曾提到过“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二十四诗品·集解》对它的解释是“意思形象”，应该说这一解释并不确切，只是一种粗浅的解释。当代西方关于“意象”的解释中，有一种把诗歌中出现的各种物象，例如梅花、兰花、柳丝、月亮、芳草、澄江等等都看作意象，……。这样的认识也是不妥当的。诗中的意象应该是借助于具体外物、运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一种作者的情思，而非那类物象本身。那些物象本身如果离开了作者的艺术想象和构思，就只能是单纯的“象”，而非诗歌的“意象”。至于有人说：“中国古典的‘意象’是指用具体的形象曲传一个只能心会的玄妙的抽象意义，简单地说，就是象

征。”则更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一论断，要么是把《易》之象和诗之象等同了起来，把《易》之象和诗之象都看成了“义理寄宿之蘧庐”或“理窟”，或更通俗的说法，叫做理念的号筒。……

钱先生在此段论述旁边的批示为：

此段甚好。

其故何故，可深长思，盖古文人借承《易经》用语，而非哲学家之精思析理，所谓“意象”每即是“意”，明人方以“意象”为“意”+“象”，尊文下面已讲了。

所谓“其故何故”，即指我文中所说的唐宋期间，“境象”、“象外”的提法很多，“意象”的提法却不多见。且后人在《二十四诗品·缜密》的《集解》中，把它释之为“意思形象”，所谓“可深长思”，即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深长地思考。钱先生接着写下的几句批语，正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一回答与他前面批示的刘勰所说“意象”实即“意”之一字同旨。但我当时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未曾认真、深长地思考，进行细致的分析，就望文生义地认为“意象”的问题，是刘勰提出的。钱先生明察秋毫地提出这一点，正是他过人的精审卓识之处。

应该说明的一点是：我的文章发表时，虽然接受了钱先生所提出的宝贵的意见，却未做任何说明，这绝非拾金而昧，而是出于不愿打钱先生旗号，借以炫耀自重的原因。在此文收入我的古典文学论文集《形象·意象·情感》一书时，我曾加了一个题注予以申明：“本文发表之前，曾经钱锺书先生审阅并批评，谨表谢

意。”至于怎样“批评”，未作说明；这里则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说明。

6. 在我引用明人王廷相《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的“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那段著名的话旁边，钱先生又批了下面一段话：

此段引得好，“意象”是真正的“意象”而非“意思”了。明人如前后七子用“意象”皆与此合，而非六朝、唐人所谓“意象”矣。

这仍是钱先生关于我文中论到的刘勰、司空图提及“意象”时的批语的进一步申说和阐释。

7. 我文中有列一小段：

闻一多先生曾说：“《易》中的象和《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这个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钱先生在这几句话旁边又批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当然看对“兴”作何解释。但亦无妨采用闻说，因无关弘旨。

8. 对文中原来的第四个小标题《意象和意境的同异》，钱先生批示说：